

春节幻灯

刘心武

蓦地我回忆起七十年前的春节，1953年我小学六年级，1953年过渡到1954年，也就是从蛇年过渡到马年，这个马年的下半年，我就该成为一个初中生了。因此含有春节的这个寒假，是我小学时代最后一个寒假，得尽兴地玩耍呀！

那时住在北京钱粮胡同海关总署宿舍大院。记忆中首先出现的，是灯笼。蛇年未了，马年的灯笼就已经出现在了院里。记得头年，龙年过后的蛇年，隆福寺庙会也卖应景的蛇年灯笼，有在彩色灯笼上画卡通蛇的，有做成蛇形可以提着走，蛇身可以伸缩的，有的引出白娘子，画出戏曲《断桥》场面的，这种灯笼居然最受欢迎，邻居棠棠就有过一个，点上蜡烛提着跑到我家窗外，举起跟我炫耀。那样的灯笼因为到端午节还可以再卖一次，所以制作得愈加精美，价钱当然也就较贵，棠棠家长舍得给她买，可见是家中宠儿。没到初一，院里就有一些小朋友提着马年灯笼跑动了，棠棠一手提她那早就有的白娘子灯笼，一手提只体积极大的“马到成功”造型（就是纸马上驮朵大红花）的新灯笼，到我家门前显摆，我就提上用母亲给我的钱买来的体积更大的飞马灯笼，到她跟前“拼灯”，我上下晃动灯笼，让马肋两边的大翅膀煽动，一时爆竹声响，又有别的小朋友提着灯而过，不都是应景的生肖造型，圆形带棱的最多，也有官灯型带穗的，后院潘家小女儿提的是一个飞机造型的，让我们一众孩子全羡慕。我属马，尽管羡慕飞机灯笼，但对手里的飞马灯笼还是很珍惜，而且我宣称：“我这也能飞啊！”棠棠力挺我，我俩就提着灯笼跑起圈儿来。

我们那个大院，最早应该是达官贵人一家独占的居所。因为在东西向胡同路南，因此，和坐南朝北的典型四合院的构造相反。当中是有垂花门的正院，院中植有四株西府海棠，跟《红楼梦》里形容的一样，每到春季开花，就葩吐丹砂，丝垂翠缕。我家住这个院中院的东西厢房，打开西窗，海棠树的花枝甚至弹进屋内。都说四合院东厢房不如西厢房，但我家住西窗的进门却朝东，东西头都是通透的新式窗户，门外是大院里最宽敞的一个空间，以那个角度而言，我家住的也可以说是西房，而且住进去以前就改造成新式的了——厅和南边两间屋都铺有木地板，北边一大间父母住的主卧地上则铺的是大方砖，主卧西头还有个小小的卫生间。那时候院里许多家都需要到公用水龙头去接水使用，我们家却自家有水龙头，这是很好的居住条件了。我家住屋的门外，最早应该是富贵人家的花园，但到我们住进那院，花园的花木除了一棵高大的马缨花树以外，其余原有的山石植被都被清空了，留下一大片空地，成为院里小朋友嬉戏的福地。这块空地南边有由画廊改造成的几间小屋，也都成为宿舍，东边月洞门里另有个小院，北边排房后墙外就是钱粮胡同。

记忆的耳边不禁响起越来越多的爆竹声，记忆的视觉则恍如有灿烂的烟花显现，高处是红绿蓝白的亮点曲线降落，低处是小朋友手里点燃的小型烟花螺旋般旋转闪烁，更有放置地上如花盆般的焰火，忽然蹿升成火树银花……会有顽皮的同龄人猛然捧出响炮，点燃吓人的“二踢脚”，跟着就会有大人的呵斥声：“不是规定好不许放这有危险的吗？”……

记忆里又出现嗅觉的重叠——提着灯笼在大院里转圈，垂花门里的院中院外，东边另有名堂，西边则是一溜比较狭窄的空地，种了一排高高的白杨树，最南边有棵树龄百年以上的大槐树，古老的鼓出树瘤的树干两个人合抱不过来。大院的南边高地基上，一排整齐的住房，北边，进大门往东西，都有排房，还另套两个小院，也可以住很多户人家，而且这些住房前，有枣树、柿子树、核桃树……春节期间，除夕前开始，延续到正月十五，家家的伙食都大改善，厨房里飘出的气息，会令人馋涎欲滴。海关大院和部队大院的不同之处，就是住户来历比较多样。大体分三种：一是从延安和其他革命根据地来的干部；二是旧海关的留用人员，因为海关是一种专业性非常强而且必须与国际接轨的部门，旧海关的职员多有熟悉业务且掌握外语的；三是从北京本地招聘的后勤类工作人员。因此，各家在春节期间烹制食物，就大异其趣，从厨房飘散出的气息，会给嗅觉形成完全不同的刺激。比如中心院里居住的一位来自

东北的干部，他家小炖鸡蘑菇的香气就特别诱人；而居住在前院北房的一家湖南人，虽然你可能接受不了辣味，但他家红烧肉的气息会让你觉得不吃光闻也很解馋；还有住高台阶上南房的人家，一家是地道的北京人，满族，他家会制作炙子烤肉，大葱与羊肉加上佐料的气息，以及另一家杭州人烧制西湖醋鱼的味道，搅合在一起，倒也不令人别扭；至于我家，母亲烧得一手好川菜，像烧白肉，味道内敛，并不往外飘散……

春节期间，海关总署机关会来慰问，海关总署的宿舍也不止钱粮胡同这一处，院里孩子们最关心的是，今年发不发糖果？记得那个马年发的是小人酥糖，比前面蛇年发的硬邦邦的酸梅糖好吃多了，按每家高中以下孩子的数量，每人一份发放，记得每份都早已用纸口袋装好，里面的小人酥没有糖纸，但珠光色带纹路的壳壳很漂亮，吃进嘴里酥散甜久。海关总署机关在长安街的办公基厂，有礼堂，那几年每年春节会举办文艺汇演，各个宿舍的孩子们都要排练节目，去一显身手，我们大院孩子们连续两年排练的都是集体腰鼓，练习场地就在我家门外地，我和棠棠在新编的队形变化中，时时要并排跳跃着打，还要互相敲打对方的鼓面，非常有趣，到了台上，我们配合得更加默契，那年我们宿舍孩子们的表演，宿舍的大人们都赞比往年更出彩。

会有街道干部敲锣打鼓进院来慰问军属。我大哥早就参加解放军，在广州那边，我家门楣上挂着“光荣军属”的红星匾牌，虽然大哥没有回来探亲，锣鼓队停在我家门口，父母接受慰问，那场景也足令我自豪高兴。锣鼓队在那院潘家门外停留最久，我和棠棠等一众孩子都跑去看热闹。他家一共七个子女，老二二是个解放军空军战士，而且那年春节回家探亲，啊呀，至今回忆起来，潘二哥那魁伟的形象，还宛在眼前。电影里的解放军英雄，究竟只能观看，不能亲近，潘二哥却真真实实地站在我们面前，一米八几的大块头，跟我们这些孩子都很友善，他会把双臂两边弯起，隔着衣袖，那鼓起的肱二头肌如同铁疙瘩一般。他最小的弟弟潘七儿，就会率性跳起来，双臂如套环般吊在他一侧的手臂上，另一个邻居小孩，也就抢先吊到他另一只手臂上，潘二哥一点没有吃力的样子，左右的小孩就荡秋千般地得意晃荡，可惜那年春节我小学快毕业了，已经不可能享受六七岁小男孩那样的乐趣了，但是后来我也挤上前去握潘二哥的手，好大好厚实的手啊，心里想：他就用这手开飞机吗？……

记忆中那瑰丽的光斑出现了：那年春节，我制作了幻灯机！少男女课余玩耍，不能只满足于玩现成的玩具，最好能自己制作好玩的东西。忘记由头了，反正那年腊月，我先去隆福寺庙会买了两个凸透镜片，这是幻灯机的关键部件，从家里找到马粪纸，卷起来，把凸透镜片一前一后夹放到里面，镜筒也就有了，幻灯机的机体呢？需要一个大纸盒子，搜遍家里，不是太大就是太小，正

好棠棠来找我玩，成为演幻灯的积极参与者，她告诉我，正看见住月洞门里的郭大爷，从隆福寺买鞋回来，那鞋盒子挺大，要不，咱们问他把那鞋盒子要来吧？郭大爷在机关里是大食堂厨师，胖胖的，慈眉善目。他在机关的联欢活动里，总上台唱京剧，那年春节联欢，他正准备唱《赤桑镇》，偶尔听见他在家吊嗓子。父亲说，他唱老旦，很有李多奎的味道。李多奎谁呀？管是谁呢，我就跟棠棠一起去他家，讨要那鞋盒。郭大爷郭大妈迎我们进屋，听明来意，爽快地把鞋盒给了我们。拿回来，在长方形的短面，量好直径挖出两个圆孔，正好把镜筒插进去，但是还必须要制作幻灯片的插板，要在鞋盒长的一面后侧，抠出两面对称的插口，把插板放进去，使其能够左右拉动。制作那插板可是个细致活儿，需要用硬纸壳先剪成两片对称的，再在插板框的格式，再在框旁用若干层纸条，粘在一起，底部封住，上面留插口，以便插入幻灯片。幻灯片用什么制作呢？当然用玻璃片，可哪儿去找我们设计好的那种规格的玻璃片呢？说来也巧，那天恰好北房的唐太太（那年头还时髦管已婚妇女为太太）来我家，向母亲请教米粉肉的做法，听说需要小玻璃片，笑道她家正好碎了玻璃窗，已经请人安装了新玻璃，那些碎玻璃正愁不好处理，毁坏剩余的玻璃面积其实不小，可以分割成许多的小玻璃片呢，母亲就指点我们：陈叔叔有玻璃刀，你们找他，不就行了吗？找到机关木匠师傅陈叔叔家，果然心想事成，他不但把唐家的废弃玻璃给我们切割成了一摞等大的幻灯片，还借了我一个大号手电筒，里头放四节一号电池的那种，这样，放映幻灯片的光源也不发愁了！

剩下的事情，就是绘制幻灯片了。在我家客厅的大八仙桌上，研好浓墨，在那些玻璃片上，也只能用墨笔勾勒出简单的图画。我先画了一个最简单的，就是下面一道杆，代表大地，上面一个圆圈，射出些光芒，放到插板框里，进行第一次试映。棠棠用手电筒放光，我调整镜筒让映到墙上的画面焦点清晰。那时候天还没黑，墙上的画面还看不大清楚，但是我已经激动得不行，喊出第一条解说词：“太阳出来啦！”后来，我就尝试了人生中的第一次编剧，也算是第一次兼导演。我从那“太阳出来啦”往下编，指导棠棠在玻璃片上画，底下情节的发展是：公鸡很高兴，不用再啼鸣；母鸡也高兴，可以下蛋了；树上鸟儿跳；河里鱼儿笑……棠棠画不下去了，抗议：“鱼儿怎么笑？”我就自己操笔，画了一个咧嘴的鱼，算是笑；棠棠说：总这么着，有什么意思呀？得来个邪乎的，于是她边说边画：狐狸跑来了，蝴蝶飞来了，狐狸变美女，蝴蝶变飞机，美女坐飞机……我接着往下编：飞机降大海，飞机变轮船，海里大鲸鱼，鲸鱼吞轮船，来了海龙王，又来美人鱼……一下子十个幻灯片画出来了，都晾在桌上等着墨干，最后这套幻灯片达到了三十图，最后几图是：盘里大饺子，月牙看了

馋，扶起月牙，月牙变成圆。棠棠完成最后一图，上头写个“完”，这才想起，前面还得有个片名儿。我随口一说，棠棠大笔一挥：《开心一天》。

春节最是亲情、友情、同事情、同学情、同龄情、邻里情……大交织的日子，当然啦，还有爱情。我还小，只是读文学书，书里有爱情描写，我的阿姐，啊哈，她呀……她比我大八岁，1952年考上了东北农学院，攻读农业机械化专业。那年寒假，回家来，过完春节，再回哈尔滨继续学业。我本来盼着她寒假多跟我玩玩，谁知她几乎天天跟她高中同学，那人的名字，在王蒙自传那部里，写上了，后来我的姐夫不是他，但那年春节，他跟阿姐黏在一起，让我气闷。他在另一所著名的中学任党支部书记，也有寒假，方便了他跟阿姐聊聊天，那时我家客厅南面两间屋，我住西头一间，阿姐住东头一间。说是跟阿姐一起读一本苏联小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可进去就把门掩上，我也邀棠棠跟我一起到我那屋一起读安徒生童话，我就大敞着门……

不过我还是要感谢阿姐和他的男朋友。那晚我要正式放映我的幻灯片，棠棠也帮我招呼了不少院里的小伙伴。幻灯放映最后确定当银幕的那面白墙，原来贴了一张街道来慰问我们家属时，赠送的上海年画，父亲母亲都说画得好，说原先这些画家都是画月份牌旗袍仕女的，现在也画新社会新生活了。记得那幅年画画的是新中国草原上的景物和人物，母亲说那画家叫何逸梅，很高兴他现在有这样的新画，把遥远的草原新生活带进了我们北京的大院。但是那幅画妨碍了我的幻灯放映，阿姐男朋友很细心地帮我们暂时揭了下来，放进阿姐那屋存放。

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来临。晚饭后，片名《开心一天》的幻灯片正式在我家客厅开演了。遗憾的是院里来的小朋友并不多，像潘小七还挑三拣四，问：“怎么没有带色儿的呢？”父亲也只略看了几幅，就进卧室去了，倒是母亲笑眯眯从头看到尾，阿姐和她的男朋友呢，坐在我家客厅那花盆炉子后头，放映当中我偏头观察他们，他们哪里在看映出的画面，他们在对看，嘴里没出声，眼睛在说话！虽然放映结束，他们也鼓了掌。

那是童年里最难忘的一幕。棠棠，那个当时扎着两根粗粗粗辫的姑娘，她属蛇，比我大八岁，是那场幻灯放映的功臣。记得去过郭大爷家以后，她跟我说：“郭大爷家有穿衣镜啊！真想站跟前照照！”那时候她家、我家都颇富裕，但家里都没有镶大穿衣镜的衣柜。我本想冲她来一句：“臭美！”望着她红扑扑的苹果脸，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我没说出口。我们那算当年的文艺小青年吧，但她的心，比我高很多。记得1955年，上映了电影《祖国的花朵》，导演拍摄前到北京若干小学去挑选演员，有一期的《大众电影》杂志，还刊登出一大堆备选少男少女的照片。那时我和棠棠都已经上到初二，有天她在马缨花树下，跟我说了句惊心动魄的话：“他们怎么瞒着咱们，就把这片子拍出来了？”1960年后我家迁离海关大院，从此与棠棠失去联系。她后来应该没有进入演艺界。

已经是腿脚不便的耄耋老人了，怎么还总回忆七十年前的事情？春节又到，这次回来的是老年，属马的又逢龙年，正所谓龙马精神，老当益壮。愿现代的生命都有精彩的童年，愿童年的纯真欢乐永伴余生。

癸卯年过渡到甲辰年之际 温翰高中



笔会

织出一朵花儿
(年画, 1958年出版)
张大昕

「文汇报」
微信公众号
织出一朵花儿
(年画, 1958年出版)
张大昕

1970年严冬时节，二十岁的阿爸被分配到西日嘎小学当录用教员（相当于公办教师）。大雪覆盖着科尔沁草原，阿爸从巴镇沿着两条黑黑的车辙印往西日嘎村走，翻过几座山，荒凉、萧条的村庄慢慢浮现在眼前。他站在村西的斜坡上，用温热的目光注视着这座山沟里的村庄。

当时，西日嘎小学满目破败，看起来快要荒废了似的。阿爸来之前，学校只有一个录用教员，民办教师来一个走一个。五个年级共有九十八名学生，以两个复式班的形式，挤在用高粱秸秆做“墙”式出来的两个教室里上课。新学期开学不久，各种问题层出不穷。教师的讲课声、学生的吵闹声混合着高粱秸秆的味道，飘荡在教室里，既热闹又让人头疼。但比这更难的，是怎样管理学生。

五年级有个体格壮实的男生，只比阿爸小几岁，他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想骂谁就骂谁，想打谁就打谁。以前，他为了不让一个女教师上课，竟站在教室门口，对着女教师撒尿。男生的阿爸更是出了名的无赖。另一个教师担心惹出其他事端，一直敢怒不敢言，他劝阿爸也不要管这个男生，以免惹祸上身。可这个男生越来越过分，总是一个个人强占三个人的座位，无论阿爸怎么说，男生就是不听。有一天男生又在占座位，把同学挤到一边，阿爸劝说无果，一气之下，用力推了一下男生。男生倒地后，立刻起身跑回了家。不一会儿，男生领着他的姐姐和几个壮汉，气势汹汹地来到学校，把阿爸围在中间，轮番辱骂。起初阿爸跟他们讲道理，但他们根本不听，也不让阿爸说话。他们骂着骂着就要动手，其中一个壮汉冲上来，企图踢阿爸的脖颈。阿爸大喝一声，一把打掉壮汉的手，回身怒斥：“都给我滚！”阿爸比几个壮汉还高出一头，也更强壮，站在包围圈中，不仅毫无惧色，反而在气势上更压了他们一头。几个人谁也不敢再上前。男生的姐姐见状边往回走边喊：“你等着，我肯定让你丢掉工作！”阿爸回击：“我从来不怕你们这些人！”

男生的姐姐是公社广播站的播音员。她从第二天清晨开始，擅自广播不断夸大其词地重复：“西日嘎小学的老师殴打学生，应该撤掉职务。”村里的几个老人找到阿爸，了解到情况后，气愤不已。他们走到广播站，冲着门大喊：“你干啥好人，颠倒黑白，我们去旗政府反映情况，撤掉职务的应该不是你！”加入老人们队伍的人越来越多，男生一家顶不住舆论压力，拉着男生走到学校，向阿爸认错。阿爸轻轻挥了挥手，这事就算过去了。此后，这个男生虽然还很顽劣，但再也不敢在学校闹事。

两名教师包揽了五个年级的所有课程。两个复式班依然挤在一间大教室里上课，学生人数时有变化，这也是那个年代才有的特殊现象。两个教师每节课下课前得布置好作业和复习内容，他给下个班上课。嗓子肿胀、沙哑，课上到腿酸对他们来说是常有的事。阿爸讲课非常认真。有一节课内容是计算平行四边形的面积，当时正赶上几个木匠在学校干活，阿爸把他们的工具借过来，领着学生们测量计算教室门窗、桌椅的面积，课堂气氛十分活跃，效果也是出奇的好。教育局局长领着其他学校的负责人（相当于校长）和教师们，专门过来听阿爸的课。阿爸他们在旗里获得了表扬。

1973年夏季，西日嘎小学搬到村西南新建的土房大院，终于像个正规的学校了，教师和学生的数量也都有所增加。阿爸是西日嘎小学负责人。学校总共十二间土房，两间为一个教室，一、二、五年级有单独教室，三、四年级依旧是复式班。另外三间，一间是食堂，一间是办公室，夹在办公室和教室之间的那间是厅。土房东边还弄了一个宽阔、平整的运动场。公社没有更多的钱来盖宿舍了，阿爸暂时住在办公室，直到一年后才在土房边加盖了一间宿舍。阿爸与给学校看门的老人一起住，阿爸从老人那里学到了很多种地、放牧的知识。

第二年春季，阿爸参加全旗教职工大会，有关领导传达文件，并提倡在艰难时期学校应该推广勤工俭学，让学生们也通过劳动得到锻炼和成长。阿爸兴奋不已，觉得眼前所有的困难通过努力劳动都能解决。回村后，阿爸把会议内容讲给公社党委书记、大队党支部书记和村民们，大家开会决定围着学校植树造林。

说干就干，在大队的支持下，西日嘎小学从旗林业局买来十四个品种的杨树枝条和榆树条，动员村民和高年级的学生，在十五个池子里插上树条，浇上了水。阿爸像呵护孩子一样呵护着这些树条。等到夏季，树条生出了长长的根须，再动员能干的劳动力，把长成一米多高的树苗移栽到了学校土房东边的地皮上，运动场被包在其中。剩下的树苗栽在学校四周，以及东南方向的毕勒古泰山山下。土房前还修建了几个花池，里面撒上花籽。不久后，花池里开出各种颜色的美丽花朵，点亮了荒凉的山沟。

阿爸领着教师们来到毕勒古泰山山下，在树林里的水磨井旁边，修了一个七十二平方米的露天泳池，深度一米二，解决了学生们的洗澡问题。浇灌树木花草时，用一头健壮的毛驴拉水磨，孩子们洗澡时，就自己推动水磨，树林里回荡着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到了晚上，村民们也会结伴去泳池洗澡。这些建设和思路，如今看来并不稀奇，但在五十年前，对于封闭落后的西日嘎村，乃至整个旗里来说，都是少见的。原本荒芜、沉寂的山

阿爸初到西日嘎

阿尼苏

沟，也因此变得鲜活、明亮。这一年，全旗小学的负责人纷纷到西日嘎小学参观学习，吸取经验。

土房不像砖房一样牢固，每年雨季来临前，队里会组织劳动力，免费用碱土扶一遍学校土房房顶。阿爸说：“学校是村子的，村子是村民的，大家从心底里不分彼此。”

植树造林属于建设学校，绿化村庄，并不能短时间带来经济效益。那时，学校有十五亩地，教师和高级别的学生们在地里种上高粱、玉米和蔬菜，每年收益几百元。这笔钱全部用在学校的门窗、桌椅、玻璃的修理上。也是这一年，在全旗小升初的考试中，西日嘎小学学生海林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阿爸也在这一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西日嘎小学刚刚步入正轨，阿爸又被调到了暂时没有负责人的西日嘎中学。这是一所社办学校，只有高一、高二两个年级的两个班，生源复杂，有些学生的年龄比阿爸还大。常有学生喝酒打架闹事，甚至有学生殴打过教师。公社书记笑着对阿爸说：“呼老师，只有你能镇得住这帮学生。”阿爸根本不惧这些，他给学生上思想政治课，几节课下来，那些“问题生”果然就收敛了许多。

那时，西日嘎村与南边的扫高吐村因为争夺边界上的一片二十五亩田地经常发生冲突，有时还会大打出手。每年春季，两村人都会在这里种地，往下无论播种、犁地、浇灌、秋收，两村之间总发生矛盾。在一次冲突中，两村互不相让，眼看着又要动手，阿爸与两村书记商量后，说：“中学是公社的，不属于任何一个村子，两个村的孩子们都在中学读书，这块地就归中学吧！”这个方案得到了两村的一致认可，长达二十年的矛盾也随之解决。于是阿爸领着教师们种植这片田地，同时还在校园里养猪，解决了学生们饮食荤素搭配的问题。

有人告诉阿爸，往年两村里有几个蛮不讲理的年轻人，每年秋收前都要在边界上的田地边转悠，谁敢靠近就挥舞镰刀恐吓。他们会先收下长势好的高粱。谁谁管不了他们，他们谁也不怕。于是阿爸提前放话：“谁敢再动学校的田地，我就找谁算账！”那年夏天盖房子，灌满碱土的大洗衣盆足有二百多斤，需要两个人抬才能挪动，即使村里那个号称最有气力的壮汉，也只是刚刚端起来，就喘着粗气不得不放下了。阿爸却一把握起来，在房顶上稳步走了三圈。

阿爸待人接物温和善良，但一发怒，脸上的威严让恶人胆怯。一天晚上，阿爸和额吉走夜路时，突然从黑暗中跳出来一个人，掏出一把明晃晃的匕首，准备抢劫。阿爸夺过他的匕首，把他抱起来，直接扔进了路边的沟里。用额吉的话说：“就像拎小孩子似的。”额吉把这事当笑话一样讲，从此村里的几个恶人躲躲着阿爸走。那年秋季，不仅没人敢动学校的田地，那几个“蛮不讲理”的年轻人居然还来学校帮着秋收。最嚣张的那个说：“呼老师走过来时，感觉像一座山移过来了。”

阿爸在西日嘎中学干了两年，又重新回到西日嘎小学。又过去两年，阿爸调到公社工作，当了公社党委秘书，开始了他的另一个职业。哥哥、姐姐和我都先后在西日嘎小学读过书。我们小时候，阿爸经常让我们坐到自行车横梁上，双手用力握住车把，一遍遍地穿过山脚的美丽花朵，点亮了荒凉的山沟。

如今，阿爸讲起这段往事，说：“那个时候，哪里需要我，我就去哪里，无论到哪里，我都会满怀热情地工作。”昨天，阿爸看着电视感慨：“今年是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第50年。”